

精神向度：黄河治理与中华民族 集体应对中的家国本位

◇王明钦 岳鹏星

古往今来,黄河水滋养万物,哺育了从远古延续至今的炎黄子孙,但其决堤改道也给两岸人民留下了不尽的惊悸和伤痛。黄河安澜、海晏河清,成了中华民族千年寄托的梦想。在黄河治理中,“黄河清,天下宁”,治河与治国的高度统一,是中华民族蕴含着家国情怀文化视域下的集体应对。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种个体、家庭与国家血肉不可分割关系的观念,是一种集体生存法则,是一个经历了人世间天灾人祸、国破家亡深重苦难的民族经过千百年思维沉淀而成的集体本能。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集体主义精神。精神有了归属,生命就有了意义。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华民族个体奋斗和奉献的法则。尤其在民族面临危机时刻,这种集体主义的、积极向上的家国情怀就愈加凸显。在黄河治理中,家国本位的集体应对实践,在精神向度上实际上形成了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源自黄河流域先民们为应对自然灾害而形成的聚族而居的集体主义社会生活形态,本质上就是一种和衷共济的互助精神,一种深具乡土情怀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从黄河治理中孕育的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

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是一种互助共襄的爱国主义精神,它是黄河文化的核心内里,贯穿于黄河文化及中华文化发展的始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鲜明标识。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是一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共建共享的“共同体精神”,这种精神的生成与黄河流域一体多元的地理生态环境有关,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有关,也与黄河流域先民们应对灾害的集体模式有关。黄河水、黄土地、黄皮肤,这些相同的文化基因是黄河赋予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身份底色,因而黄河两岸的地理生态及这个生态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模式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意义重大^[1]。

首先,黄河流长域广、两岸生态复杂,要求黄河的有效治理必须是一个上、中、下游有机整合的综合治理体系。由于黄河自西向东流经9个省区,流域面积达到79.5万平方千米,从上游到下游经历了高原、丘陵、平原在内的三级阶梯,自潼关以东,河床坡度下降800米,又有汾水、洛水、渭水汇入,自孟津以东进入华北平原后因地势平缓,黄河在这里时而流向东南,时而流向东北,长期南北摆动,任意流动,导致其每个河段的地理生态差异巨大,相应地出现自然灾害的类型、频度、影响也各不相同^[2]。这种生态特点决定黄河治理有人多地广、情况复杂的特点,其中任何一个河段或几个河段的单独治理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效果甚微,甚至会产生“以邻为壑”的无序混乱局面。因而要有效治理黄河,不仅应该采取疏导的科学方式,还必须像当年的大禹一样,沿河跋涉13年,在通观全局的情况下进行综合治理,最终使之归流大海。唯有如此综合治理,方能取得黄河治理实效。而这种综合治理,就需要黄河两岸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的人民打破地域、文化等界限,通力合作、共襄互助,共同守护美丽的家园。

其次,黄河流长城广、两岸生态复杂,要求黄河的有效治理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黄河漫游中国中北部,地跨9个省区,涉及范围宽广,单纯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地方政权无力做到对黄河的整体治理,很容易形成政治多统背景下“以邻为壑”的混乱局面。如春秋时期,由于周室衰弱,力不能及,于是黄河流域各诸侯国就站在各自局部利益的基础上“以邻为壑”各行其是,导致当时黄河治理的失序,给两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极大危害。同时,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央王权衰弱造成的黄河治理失序,才使得包括孟子在内的思想家提出了“定于一”的概念。因为从现实的角度讲,他们认为只有一统,才能天下安定。也就是说,“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团,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处于自然力量的驱使”^[3]。可以说,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密码早已蕴藏在黄河那漫天的洪水中了。而一个强有力的核心领导下的黄河治理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一统背景下的互助共襄模式,因为“一统”之下的中央政府才可以代表黄河上游、中游、下游的所有人民,才可以在通观全局的情况下统一调配资源、人力,对黄河有一个通体认识基础上的有效治理,在资源、人力不浪费的基础上给予所有人最大的安全。

再次,黄河处于中北部的地理区位也蕴含了中华民族互助共襄的集体主义精神。黄河尤其是黄河的中下游地处中国中部,其西部、北部与游牧民族相邻,南部则与长江流域相接,是中国文化流通、交通便利的枢纽核心。由于“十五英寸等雨线”在中国从东部向西南穿行,其中一段与长城大致符合,这不仅使青海、西藏与中国本部分隔,也使等雨线两侧呈现出迥然不同的自然生态:等雨线的东南降雨量大,农业比较发达,人口规模较大;等雨线的西北降雨量小,农业生产规模相对较小,以游牧业为主。于是,这条等雨线就成为中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历史上中原的农耕民族与塞外的游牧民族连亘了两千年的爱恨情仇,这两种文明系统在几千年的

历史长河中相互交流碰撞,在一进一退之间推动着历史的进程。尤其是在气候不利的情况下,北方的游牧民族就不由自主地南下劫掠南方农耕民族的财富。而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面对这种来自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大肆劫掠,小农经济下的“小民”是难以自保的,其必须依附于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方能抵御来自异族的威胁。因此,通过观察气候变迁与历史的关系,可以发现农业文明时期大致的模式是,气候只要变暖就会导致农耕文明向北扩张;相反,气候只要变冷,就意味着游牧民族全面南下^[4]。历代中原统治者无论是修筑长城防御体系、和亲结盟,还是深入漠北、饮马瀚海,总是期望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骚扰的问题。历史上就有秦始皇征招全国之力修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西汉武帝时期对匈奴采取积极性进攻策略,但无论哪一种,单个的个人和地方政权都无法承担,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方能保卫当时这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而黄河流域这种依靠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抵御外来游牧民族入侵的方式蕴含的就是一种互助共襄的集体主义精神,一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当然在实践中,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的生成还与黄河流域人民特有的应对灾难的模式相关。黄河流域由于其独特的黄土粒性特质和气候等综合原因很早就确立了早耕农业文明的生态方式。黄河流域的先民们以家为单位,聚族而居,随四时的改变,以地为生,过着与世无争的农耕生活。但这种小农经济下的一家一户的小家庭,是无法抵御自然灾害和战争侵袭的。于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守卫自己的家园,黄河流域早在夏商周时期就形成了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的生产生活模式。这种生产生活模式既是黄河流域人民对黄河生态的主动性适应,也是黄河流域独特地理、气候在黄河流域人民心中的一种长期的反复的强化和映射。

总而言之,从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起源的角度看,聚族而居、家国一体的生存模式与黄河流域独特的生态之间的相互反复映射,最终蕴含了黄河文化互助共襄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强有力核心领导下的集体主义抗灾模式,在此后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又不

断得到强化,这种精神和模式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标识。

二、中华民族的家国本位情怀助力中华文明发展

中华民族在走出黄河流域后,以主导姿态走向全国,最终形成疆域辽阔、体量庞大、智慧超群的中华文明。而在这个过程中,源自黄河流域的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逐步得到强化、沉淀,并最终定型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标识。

(一) 中华民族生存空间对于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的形塑

随着华夏族群由黄河流域走向全国,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最终形成了一种庞大的、独特的、自立于世界的地理版图。从地图上看,中华民族的整个生存空间位于亚欧大陆东段,东西跨经度 62° ,南北跨纬度 49° ,是一个幅员辽阔且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虽然历史上各王朝的疆域时有消长,但中国各民族整体的发展空间是明确且稳定的,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地域共同体。而且这个共同的生存空间还形成了一种对内开放、对外相对封闭的地缘状态:一方面,东北有大兴安岭、西伯利亚相隔,北部横亘有广阔的蒙古高原和沙漠,西南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而东南地区则为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 and 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整体来看,中国对外有高山峻岭、沙漠、海洋为界限,尤其是北边的沙漠和西边的高山形成了工业时代以前人们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这种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使本就远离世界上其他文明中心的古代中国人对外交流更加困难,从而也决定了中华大地各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具有很强的内向性,使各民族对传统中华文化的认同性和凝聚力不断加强,呈现出完整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在中华大地内部的自然框架中,又包括高原、平原、丘陵、盆地等结构完整的地理体系,地大物博,基本能够自给自足,又使国人并无对外开拓的需求。实际上,中国各地区间确有自然地理上的障碍,但也总有相通的通道:内部从东部沿海到西部高山沙漠有三四条平行的道路,从南方鱼米之乡到北方

戈壁高原有许多隘口,以及沿海靠着季风和洋流带动形成多条航线。于外严整而于内气象万千,虽有高山大河阻隔形成不同的地理区域,却又在各自然区域之间存在若干通道,使各族可以进行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所以不同区域虽似隔离,却能持续不断地交流,终于合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地区。

综合言之,中国的世界既封闭又开放,各地区之间看似分割,实际上却又联合。正好像,“在中国这个巨大的舞台上,有牧人的胡笳,猎夫的号角,高低的芦笙,船夫竞渡的鼓声,田间低沉的中音,山上高亢的唱腔,有时夹杂着狂风暴雨与浪涛,有时则伴随着江南的和风细雨或山地的松涛瀑布,诸音杂陈,但最后却交织成一个最复杂、最丰富的交响乐”^[5]。因此,正是这种对外边界清晰、对内气象万千的广阔生存空间促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相融相合,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同时这种独特的地理空间又反向加强了中华民族在胎胞时期就形成的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的原生性和独立性,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

(二) 农耕与游牧民族的交融淬炼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

中华大地上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交流对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形成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它丰富强化了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中国地域辽阔,内部自然环境差异巨大,在工业革命前自然形成了游牧和农耕两大区域。其中北至瑗瑄,中经陇山、横断山脉东缘,南至腾冲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即被当代人称为“胡焕庸线”,这条线既是中国半湿润区、半干旱区的地理分界线,也是农耕、游牧两大文明的分界线。这条线的两边因自然地理环境迥异,人口与经济分布均形成鲜明的对比:东部因降水量较大形成了农耕文明区域,人口较为集中;西部地区则因干旱形成了游牧文明区域,其间穿插分布着小块河谷与绿洲农业区,但“耕地面积仅占全国总面积的7.7%,人口占全国总数通常在10%以下”^[6]。与此同时,不同区域的居民根据当地的自

然地理条件,还形成了北粟南稻、东渔西牧等各具特色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而这种西部游牧区、东部农耕区的格局使东西各民族所生产和创造的财富不仅为本民族所需,也为其他民族所需,形成了多元互补性。随着中华民族的向外发展,繁荣开放和战乱动荡以交替并行的演进方式加剧了各民族之间历史性的交流与融合,这些交流与融合不仅使中原农耕民族的日常生活习惯、生产工艺与文学艺术、思想文化深受北方游牧文化影响,游牧文化也在中原农耕文化的巨大冲击下表现出强烈的汉化趋势^[7]。民族的融合与碰撞,一方面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和传承提供了物质条件,这就在交流中使源自黄河流域的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的内涵得以丰富。另一方面,在中华大地上所有的文化交融中,源自黄河流域的黄河文化始终处于最高文化级别、起着主导引领的作用,这就又丰富了家国本位中的爱国主义因子,并使之逐步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重要内容。

其次,具有历史连续性的精神文化认同使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得以延续。余秋雨曾在考察四大文明古国后对古印度文化在历史上的中断、湮灭有过这样的论述:“它有过太多的‘对手’和‘主子’,有过太多的信仰和传统,有过太多的尊荣和屈辱,有过太多的分裂和崩溃,结果,文化的灵魂散了神,混沌一片。”^[8]但中国文脉则与此相反,我们自初始阶段始终有一个核心和主体构架。李俊认为,炎黄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祖文化、龙头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从古至今,“中华”“中国”之称谓,都是与炎黄紧密联系在一起^[9]。王震中先生认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历史上,从先秦时期的华夏民族,到秦汉以来的汉民族以及中华民族,都是以华夏文化为核心为主干的文化民族。”^[10]可见,自炎黄—华夏—汉族—中华民族,华夏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核心,其强大的凝聚力不仅避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中断,而且其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优越性凝铸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同质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标识,得到了中华大地上所有民族的认同,同时这也使在华夏时代就生成的家国本位集体

主义精神得以延续,并以主导文化的形式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标识。

(三)大一统的政体建构了家国本位文化的制度基础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将古代文明的发展分为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并认为希腊文明初期就呈现出文化统一与政治分裂相结合的特点,但随后一系列的战争把它投入了疲惫不堪的境地,并使其最终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而中国却与之不同,“从汉代上溯到中华文明的初起时期,中国史的结构类似于希腊模式”^[11],但是秦汉王朝时期中国最终实现了政治统一,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确立了中国极具安定性和稳定性的社会制度。这种“以华夏族为主体,同周围许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关系的整治格局……这种格局把统一性和多样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即使在某些时期政治上分裂割据,这种民族和文化的凝聚力也毫不减弱,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鲜明特色”^[12]。因此,统一国家的稳定秩序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不仅保证了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连续性和独立性,也是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得以延续的制度保障。

总而言之,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来源于黄河流域华夏先民们聚族而居的集体生活,是由黄河流域独特的地理生态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在黄河流域先民心理上长期反复映射而生成的,此后又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实践中得到强化,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之一。而且在地域宽阔、灾害重大,个人或微小社会力量无法抵御的情况下,家国本位集体主义精神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一种互助共襄、共荣共存的互助精神,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精神,一种家国本位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独特救灾模式形成的核心和内里。

三、家国同构之下中华民族的救灾机制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第六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当时他说:“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平等一員,共同構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13]從歷史上看,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功是一個漫長的動態的過程,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家國本位集體主義精神逐步在實踐中凝鑄出了中華民族獨特的救災模式。家國本位集體主義精神來源於農業文明時代黃河流域黃河人的生存狀態,這種生存狀態具有獨特的集體主義生存特徵。

首先,農耕意味著定居,意味著合作和對和平的堅守。黃河流域的農耕民族要在生產力水平不發達的時代求得和平、穩定的定居生活,就必須能夠抵禦來自自然界和外在戰爭的威脅。但要抵禦自然災害和外在戰爭的威脅以求得生存,單靠個人或少數組織的能力是不可能的,其必須依靠集體的庇佑,因而馬克思把這種個人對集體高度依賴的共同体稱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在這種類型的共同體內,集體至上、集體主義精神超越了对個人價值的追求。而自炎黃族團延續至清朝前期的中華民族共同体就屬於這一類型的共同体。而早在先秦的邦國時代,在這種集體主義的農耕生活中就孕育出了黃河流域以家為本、由家到族再到國的由小而大的社區空間結構,這是黃河流域獨特的邦國天下觀點的體現,也是中華民族家國天下集體主義精神的由來。可以說,這種家國天下的集體主義精神散發着濃厚的泥土味,是黃河流域先民們歷經風雨仍忠實依偎在一起的精神寫照。

其次,伴隨着伏羲神農、堯舜禹湯,一套與農耕文明完美結合的、同樣發達的宗族宗法制破土而生,並隨着西周“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的分封制,把封建制中家與國、社會與國家之間的複合治理社會結構發展至鼎盛^[14]。西周結合分封制把宗族宗法擴展至整個社會,使農耕家族由緊固到松散,真正實現了由家到國的轉變,這是黃河文化也是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此後伴隨着黃河文化向全國的輻射和中華大地上其他民族的內附,中華民族逐步形成了一套獨具溫厚恭謹色調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結構,一種獨具博大舒緩性格的文化開始定型。當時的黃河人驕傲地為自己這個前途無量的家園起名為華夏——中國,以此把自己與東西南北的“夷戎蠻

狄”明確而又寬容地區分開來。這個由華夏文化圈內直屬周天子的國家,以及受周天子分封而建立的其他諸侯王國共同構成了“諸夏”,這裡的“諸”即諸多的意思,“夏”者大也,謂“中原之大大國”;或曰“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15]。從此,“內諸夏而外夷狄”的空間分布的特定屬性,“為黃河人千百年來極大影響和典型代表今所謂中國或中華民族的歷程,豎起了一塊劃時代的里程碑”^[16]。

由前述可見,家國本位集體主義精神來源於黃河流域人們的集體主義定居生活,也來源於黃河流域完善的宗族宗法等級制度的社會化治理模式,其本質上是一種互助共襄精神,並蘊含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情況下黃河流域先民們面對災難的應對模式:共襄互助的集體應對模式。由於在當時的自然災害和社會紛爭影響下,單個的小家庭過於單薄和渺小,顯得無力無助,因而要想生存,必須依賴於人們之間的援手和救助。於是在與黃河滔天洶浪及北方游牧民族鐵蹄的抗爭中,那種百人同心的集體力量,就成了黃河流域人們繼續生存的依靠。因而,家國本位集體主義精神的核心就是共襄和合,其中“共襄”就是合作、互助,“和合”主要體現為中華民族大家庭內各個民族和合相生。可以說,共襄和合精神表現出的是中華民族的一種寬容博大的胸懷和氣度,體現為對不同族群文化的包容和彼此間的互助。而在中華民族共同体自然形成的過程中,這種精神更多體現在面對重大災難時的互助共襄。多災多難使得中華民族成為最勤勞、最有忍耐力的民族,在面對災難時能夠團結一致、同舟共濟、直面挑戰,也使得中華民族自身蘊含着強大的生命力,從而使得天獨厚的中華文明得以延續至今^[17]。

由於家國形態下的中國沒有受到外在文明力量的干預,是一個強有力領導核心下的統一國家,因而其救災的內容更多指向疆域內部對國家和人民生存帶來嚴重威脅的自然災害。比如,中國史載的最早的、最重大的自然災害為堯舜禹時期的大洪水,中華民族第一個救災的傳說就是大禹治水。《史記》記載,在原始部落聯盟時代,黃河發生特大洪災,洪水肆虐中原,導致民不聊生。面對大洪災的威脅,個體家庭的力量甚至小規模的部落都難以應對。“湯湯洪水方

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于是大禹带领人民经历13年之久终于平定了水患。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的集体抵御洪水灾难的记忆。而由于古代中国是一个灾难频发的国家,农耕社会“靠天吃饭”,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等灾难对社会影响很大,因而这种依靠中央调度、共襄互助集体抵御自然灾害的经验在此后的中国代代相传,并逐步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抵御自然灾害的模式。

中国古代的救灾主要分为灾前预防、灾中勘察和灾后救济三个部分。灾前预防,即事先做好预防工作,以便救灾时能够有备无患。针对“民以食为天”的农业文明时代,灾年到来对百姓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粮食的歉收。为避免灾年饿殍遍野的情况,古代中国创造了“建仓积粮”以防患于未然的灾前预防方式,统治者认为“居安不忘于虑危,有备可期于无患”,而使国家有备无患的首要之举便是“劝农重谷,以备饥荒”(《唐大诏令集·安恤天下德音》)^[18]。至明清时期,这种救灾的仓储体系日趋完备、遍布全国,从省会乃至州郡都建有常平仓,乡村则建有社仓,市镇有义仓,边疆地区有营仓。其中的常平仓和社仓是官方救济行为,义仓是一种民间慈善活动。而这种预防方式就是一种聚少成多、共襄互助集体抵御灾害的抗灾模式的体现。比如,明清时期的户部規制每年春夏出粟,秋冬入粟,平价生息,遇灾年时按数发给散户。同时屡颁诏旨,要求各地乡绅富民捐输,或按亩征摊,或截漕粮以补缺,或开贡监名额以捐纳,以此充实仓储。而且在救助范围上也并非囿于本地,如某地发生重灾,以致本地仓谷入不敷出,也可调外地积谷支援。同时政府还积极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垦荒,重视推广农业技术,大力兴修水利设施等,作为灾前防御措施。

灾中勘察主要指古代中国形成的一套完备的救荒制度,主要包括报灾、勘灾和救灾三个部分。报灾主要是地方官及时上报灾情,层层汇总,上达中央。若在管辖区域内发生灾情,地方官员逾期不报、懈怠延误者,将受到朝廷的严厉责罚。如《大明律》规定灾荒不奏杖八十,还明令“查勘水灾,贪要赃私,不问民瘼,处以死罪”(《大诰续编》卷84)。而地方官员

除上报灾情外,还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周详地勘察受灾的程度,作为实施救济的依据,这就是勘灾。查勘灾情主要是为了对症下药,针对受灾程度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古代中国采取的救济措施主要有灾蠲和缓征。所谓灾蠲就是免除灾年时民众钱粮的赋税。所谓缓征就是当年应收钱粮延缓至灾后重征。此外为使灾民不陷入困境,政府还在灾区设立粥厂,施粥散米救济百姓。若遇冬季灾民无衣御寒,政府还购买棉衣赈济灾民。

总而言之,由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农耕社会灾害频繁,自然灾害的防治对国家影响重大。秦汉之后,郡县制的确立和中央政府的强大,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统筹行动的重要功能,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政府主导型的集体主义救灾体系。这种救灾体系下,一地遭灾,邻近各地政府必须援助,这是惯例,也是传统。同时这也是当下中国以政府为主导、“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救灾模式的历史渊源,是家国本位的集体主义精神在古代中国的重大表现。

四、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轫于黄河文明,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冲突与融合中孕育,在黄河治理中形成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在集体应对的实践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根基特质的家国情怀,进而沉淀为家国本位的集体主义精神。家国本位的集体主义精神有利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中国在历史上形成了中央集权大一统的政治体制,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这种家国本位的民族认同是国家治理的文化和心理基础,是黄河儿女在治理黄河水患时塑造的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凝聚,是炎黄子孙在民族融合中开放包容、不拘一格的包容胸襟的体现,是中华民族独特智慧、坚韧精神的生动缩影。

参考文献:

- [1]冯月季,闫文君.黄河文化符号建构中华文化认同的价值探析[J].人文天下,2021(6):4.
- [2]杨运来.明代黄河水患发生的非自然原因及其对

- 区域地理环境变迁的影响[D].郑州:郑州大学, 2006.
- [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27-28.
- [4]温铁军.从农业1.0到农业4.0:生态转型与农业可持续[M].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66-70.
- [5]许倬云.万古江河[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22:10.
- [6]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113.
- [7]王永莉.唐代胡汉文化交融与异域文化接受管窥[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 132-141.
- [8]余秋雨.中国文化课[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9:46.
- [9]李俊.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J].河南社会科学,2020(9):94-99.
- [10]王震中.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J].红旗文稿,2016(1):23-26.
- [11]汤因比.历史研究[M].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7.
- [12]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文物,

- 1999(10):27-34.
- [13]习近平在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时强调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N].人民日报,2015-10-01(01).
- [14]孙磊.“家国同构论”的重新审视:以周代国家秩序构建为中心[J].天府新论,2022(1):52-61.
- [15]姚大力.“华夏边缘”是怎样被蛮夷化的[J].思想战线,2018(1):1-6.
- [16]刘光华,楼劲.黄河文化丛书:黄河人[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184.
- [17]张自龙.黄河文化的历史与时代价值研究:评《黄河与中华文明》[J].人民黄河,2021(4): 169-170.
- [18]张涛,项永琴.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的发展和特点[J].文史知识,2010(12):21-28.

作者简介:王明钦,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党的创新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岳鹏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慈善公益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

(摘自《河南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

(上接第51页)

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斗争精神。这精神,从远古传承至今,内化深植于中国人的骨髓与血液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基因,成就了5000多年从未断绝的中华文明。

精神文化薪火相传,光大中华民族优良品质。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农耕文化,传颂着夸父追日、女媧补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和文化基因,固化了安土重迁、敬天法祖、家国同构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范式,造就了儒道互补的中华文脉,生成了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形成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

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涵养了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等方面的中华人文精神。这里历代政治纷争、兵燹人祸不断,水旱天灾不绝,磨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性格,在河洛地区形成了愚公移山精神、大别山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南水北调精神等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去传播、去光大。

作者简介:李立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黄河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摘自《黄河·黄土·黄种人》2024年第17期)